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戴康生

# 戴康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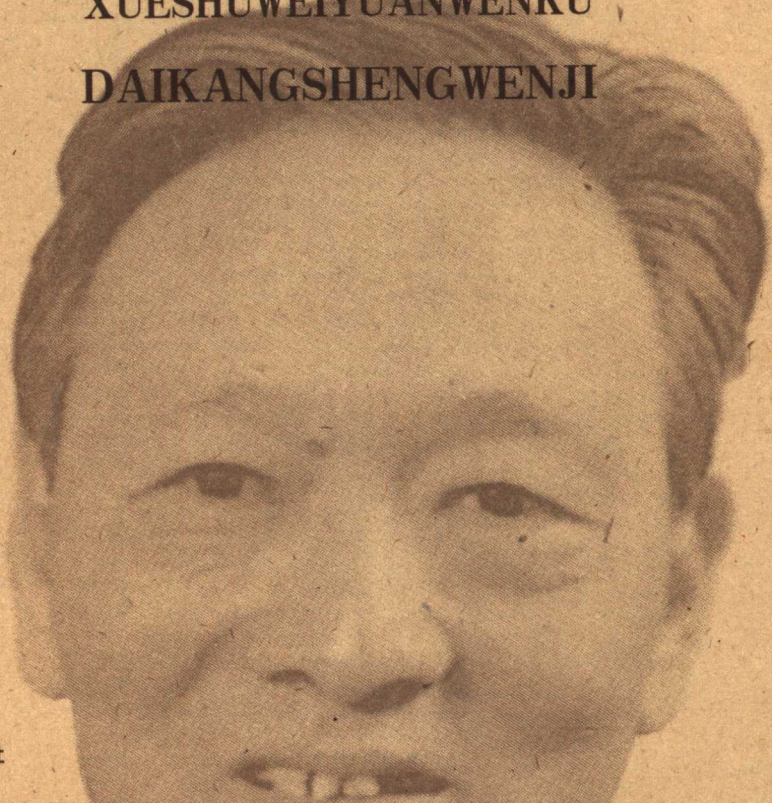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DAIKANGSHENG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戴康生

# 戴康生文集



ZHONGGUOSHE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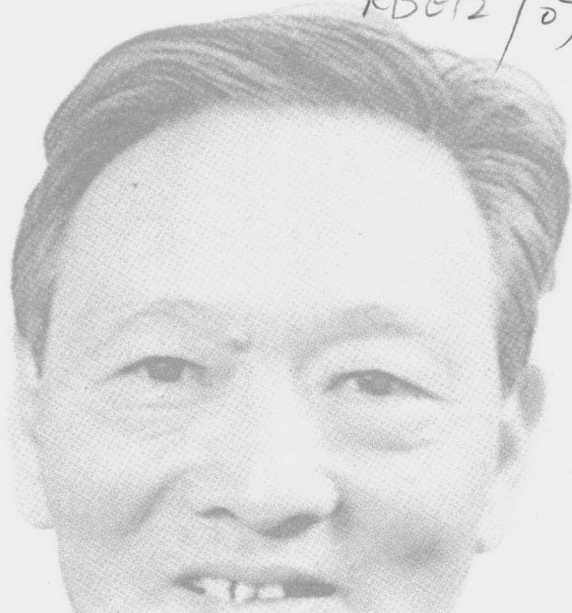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DAIKANGSHENG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712 / 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康生文集/戴康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809-9

I. 戴... II. 戴... III. 宗教—文集 IV. B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972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朱可宁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戴康生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8 字数 372 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809-9/B·58

定价: 6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戴建生



# 戴康生

小传

戴康生(1937—2003),1937年11月18日出生于上海市,江苏扬州市人。中共党员。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室任教。后参与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工作,自1964年至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职,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及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师。1983年5月至1984年9月曾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1985年至1993年期间任副所长。1994年至1998年期间任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学科规划组组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常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及基督教研究中心顾问。2003年4月9日因患肺癌,医治无效病故。

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及新兴宗教研究。合作编著有《世界三大宗教》、《世界十大宗教》、《伊斯兰教概论》、《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等,参加《宗教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科学新辞典》、《哲学大辞典》、《伊斯兰教辞典》等大型辞书的撰写。主编《宗教社会学》与《当代新兴宗教》以及主持有关反邪教的科研项目。

## 代 序

也许读者会感到奇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部分学术委员的文集是自序，而这本文集却是代序，而且文集篇幅也偏小。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属无奈，因为我的丈夫戴康生患癌症于2003年4月9日去世。他生前曾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也搞不清楚，因此只能以我现在所掌握的几本书以及在社科院网页中能找到的几篇文章为基础，从中选出一些作为他生前的文集；与此相关的是他的自序也只能由我代序了。由于我多年来从事的是基督教研究，与他搞的专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把握他的学术研究特点与创新就比较难了，这篇代序写出来肯定要比他自己写大为逊色。但无奈之下也只有如此了。好在有此机会，能将他的部分著作与文章集中于一书，便于后人对他的纪念，也就达到目的了。希望他在天之灵得到慰藉。

回顾戴康生的一生，其学术生涯较为简单。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便留校在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当老师，主攻阿拉伯哲学。此后曾全脱产专去北京牛街伊斯兰经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古兰经》，这为他以后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打下了基础。1964年经毛主席批示成立宗教研究所，由任继愈先生任副所长（所长为当时北大校长陆平兼），北大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原班人马为宗教研究所的班底。戴康生便成为宗教研究所的几大元老之一，从宗教所筹建到建立以及其后的发展变化，他都经历了。他的研究方向也因

宗教所的发展而几经变化。大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伊斯兰教研究,这一时期大体上是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末。自 1960 年毕业后,戴康生因研究阿拉伯哲学的需要而与伊斯兰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64 年宗教研究所成立后,他自然也就专攻伊斯兰教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属于四旧,自然是打倒的对象,宗教研究当然也就不必要了。宗教研究所也与当时学部其他各单位一样,整天打派仗,随后便是抓“5.16”分子,紧接着便是大批人员下干校,继续搞运动,直到 1972 年返京,才陆续恢复研究工作。工作一恢复,戴康生便又拾起了老本行,即进行伊斯兰教的研究。大约是 1977 年或 1978 年,三联书店请任继愈先生物色人选,要写一本《世界三大宗教》以满足读者对宗教的了解。任先生当时便想到了黄心川和戴康生,于是将这一任务交给他俩。经分工,伊斯兰教这一部分由戴康生承担。此书于 1979 年出版。因该书不仅是“文革”后,也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本系统介绍世界三大宗教的著作,获得有关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影响。虽然此书从今天角度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对宗教的评论方面难免受到“左”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境遇中,已是一本相当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东方出版社又再次邀请他参加撰写《世界十大宗教》中的伊斯兰教部分,此次他所写的内容已完全去除了对宗教那些较为偏“左”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地对伊斯兰教的起源、教义、《古兰经》、圣训、传播与发展、伊斯兰教法、近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等都作了系统的介绍。当时被挑选撰写此书的学者都是国内有关领域中的权威人士,如基督教部分由当时任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的陈泽民先生撰写,犹太教部分由赵复三先生撰写,佛教部分由黄心川先生撰写等。此书出版后社会上反响极佳,由此获得了 1988 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及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本文集将戴康生所撰写的“伊斯兰教”这

一部分收入其中。

与此同时,世界宗教所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承担了为高等院校文科编写一系列宗教学教材的任务,戴康生参加了《伊斯兰教史》的编写工作,承担了其中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章。此书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今年又要再版,说明其有相当的质量。本文集将这章收入其中。在《伊斯兰教史》完成后不久,宗教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又组织写了《伊斯兰教概论》,戴康生参加了其中几章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在《伊斯兰教概论》的基础上又拓展内容,戴康生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伊斯兰教》,承担了其中的第三章及第八、九、十一章,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等内容作了系统详细的阐述,这些在我看来可以视为他对伊斯兰教多年研究的结晶,因此我将其中的几章收入了本文集中。中间有一章“伊斯兰教在中国”,从题目上看似乎与《伊斯兰教史》中的有重复,但因写的角度不同,内容也有许多不同,因此两篇均收了,只是在题目上作了少许修改,将《伊斯兰教》一书中有关篇章改为“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我感到他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社会运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有更深入的研究。我所能找到的有关论文也是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

在对伊斯兰教社会运动方面,他曾先后在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及西亚非所的《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论文。这些论文的意义我想还是用戴康生自己所写的其中一篇摘要说明吧!

“自本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引人注目。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位于战略要津,资源丰富,战事不断,政局起伏动荡,成为世界的‘热点’之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世界反响强烈,该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伊斯兰

复兴运动,形成对中东和国际局势巨大的冲击力。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东、西方的评论家、新闻媒介和学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若干特点出发,围绕着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sup>①</sup>

我想这段话对这些论文的意义已表达得比较充分了。实际上,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9.11”之后,上述论文中所论及到的这一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更是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戴康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作的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看来也并未过时,可以说是相当有前瞻性的。特别是他于 1989 年在《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更是得到社会一致的好评,有关这点我们可以从 2004 年 12 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民族》第三辑葛壮先生写的《20 世纪后期国内对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综述》一文中看出,葛壮先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多年的后起之秀,他对戴康生的这篇论文作了如下的评介:

“戴康生在《西亚非洲》(1989 年第 1 期)上发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他指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同类性质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变化。一是具有国际性,它在伊斯兰世界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二是其内容波及‘全方位’,不仅反映在宗教上,且触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认为该运动在近一二十年来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一蹶不振,令失业人口和流动人口大增,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现状不满,其文化程度不高,心理承受力有限,他们普遍转向宗教,反对外来影响,形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大社会基础。而重振民族精神的社会心理格外强烈,还在于广大穆斯林对昔日伊斯兰教的光荣历史和民族传

统有着无限的自豪感,他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广大下层穆斯林用对宗教的热诚来反击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侵蚀,有的伊斯兰国家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为伊斯兰教传播和活动提供物质条件,是该运动的两个客观因素。戴康生指出该运动提出的原教旨主义绝不意味着要人们真正回到中世纪去,而是要透过宗教寻找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金(宜久)、吴(云贵)、戴(康生)等几位都是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中有较大知名度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当时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sup>②</sup>

我想现今在伊斯兰教研究中已颇有名气的葛壮先生的这段评介已很能说明戴康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了。

在伊斯兰教研究中,他的另一个强项是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他与秦惠彬合写的《试论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的特点》。此论文的意义也可以用他们写的论文摘要及论文的结尾加以说明: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探索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仅就我国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社会伦理道德、教派与宗教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个人的观点。”<sup>③</sup>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经唐、宋、元、明等几个朝代,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明末清初便逐渐地显现出一些独具的特性。中国伊斯兰教在发展历程中,为了根植于中国大地,就必须吸收儒家的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因而,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传播,发生一定的形态和内容上的变化,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认为,这恰恰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品

格;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一把钥匙。”<sup>④</sup>

中国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十个少数民族,而回族较之其他少数民族而言在我国分布最广,也较有代表性,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其他民族对他们的了解,也有助于党和国家更重视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重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另外也用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回族与儒家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了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本文集中还收入了一篇戴康生写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西道堂的文章。从正面阐述该教派如何将信仰与爱国相结合,对今天我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与宗教社会学密切相关的课题,大体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由于学科研究的发展,戴康生从伊斯兰教研究转向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宗教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才开始,至今仍是一门较为新兴的学科。80年代中下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原有对宗教的看法和定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在理论界对“宗教是什么”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有一批学者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从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宗教的定义提出了质疑,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宗教每每实施极“左”的路线就是因为这一宗教定义造成的。他们指出对宗教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有违马克思的原意的。它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更不能将它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部基石,恰恰相反,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们力主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颠倒世界的反映这一论断,即“反映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但还有些学者则仍坚持固有的认识,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称之为“鸦片战争”的大争论。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对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制定什么政策的大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所由戴康生和彭耀两人牵头于80年代中下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宗教社会学”这一课题。课题组于80年代末先后分赴天津、河南、浙江、福建等省市进行过三次社会调查,通过发放问卷,与宗教界人士、一般信徒和宗教工作者分别举行座谈会,取得了有科学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基础。经几年的努力,课题组最终写出了《宗教社会学》一书,成为我国第一本完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由于出版方面的拖延,此书直到2000年才出版。

此书内容分两部分:一是根据对国外研究的了解及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的特性,对宗教信仰者及其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及其制度、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结合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论述及介绍;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的状况 and 变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某些思考与展望。迄今为止,在学术界都公认这是我国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的几本书之一。此书于2002年10月获中国社科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作为课题组的第一负责人,戴康生对此书的出版下了很大的功夫,全书的统稿工作主要由他进行。他除了撰写有关的第二、三章,即“宗教及其特征”以及“信教者及其宗教活动”外,还几乎彻底修改了第四章“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实际上这一章可以视为是他所撰写,但我在本文集中并没有将此章收入,而只收了第二、三章中的有关内容。

此书对建立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戴康生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他所撰写的“什么是宗教”这一节中就可以看出。他首先从分析西方宗教社会学各流派对宗教的定义入手,进行比较和判断,最终论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

一段话才真正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论证实际上否定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种容易引导人们在宗教政策上犯“左”的错误的论断,有力地支持了提倡“反映论”是宗教理论基础的学者们的意见。

就在《宗教社会学》陆续完成之际,戴康生和彭耀两人又参加了江流组织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的撰写工作。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要求他们撰写一本《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此书是理论性与政策性极强的著作。戴康生撰写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世界宗教与发展趋向、中国宗教的新现象等部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强调“宗教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表达了人们对所信奉的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崇敬与投靠”,宗教是“一种特定的感情与体验,能满足某些人们的心理需要,是人类一种复杂的精神生活”,“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等等,这些阐述对进一步纠正长期以来我国在宗教上实施“左”的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戴康生还对自然、社会、文化、认识及心理等造成人们具有宗教信仰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宗教不仅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由此他论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必需制定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宗教问题关系到千百万群众,宗教工作历来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界是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对于保持国家的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推进社会主义两个

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对当代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宗教的新现象作了前瞻性的透彻的分析。此书无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是当今有关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不可多得的好书。此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据负责这套丛书的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说,她认为,这本书是这套丛书中写得最有水平的书之一。我将此书中戴康生所写的有关内容收入了本文集之中。

第三方面的研究领域是新兴宗教。这一工作是从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国外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如火如荼,而我国则从90年代中才起步。戴康生与宗教所一些同事看到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法轮功事件出现后,他们更感到作为宗教学者有义务有责任开展对新兴宗教,包括邪教的研究工作。由此他牵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当时课题组决定,鉴于“新兴宗教”一词对我国读者而言完全是个新名词、新概念,为使中国人对新兴宗教有所了解,先编写一本《当代新兴宗教》,对什么是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特点与类型、现代社会与新兴宗教等基本概念与情况,以及国外及台湾的一些较有影响的新兴宗教(包括邪教)逐个进行阐述和介绍。戴康生对此作了大量的组织和统稿工作。本文集虽只收集了他在《当代新兴宗教》一书中所写的前言,但他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是亲眼目睹的。此书出版后,他又与课题组成员积极筹划对新兴宗教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正值此时,“9.11”事件发生,全世界对恐怖主义都高度重视,戴康生“在人们关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时候”,他又开始思考“邪教的极端行为同恐怖主义有什么关联”的问题<sup>⑤</sup>,由此写了有关论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校要编写一套教材,其中有一本是《当代世界民族宗教》,约请戴康生撰写一节“新兴宗教的发展”,在此文中他简明地阐述了新兴宗教及其特点,新兴宗教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当代新兴宗教与邪教的关系

系以及邪教的一些特征。这两篇论文篇幅都不长,但探讨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我均收入了本文集中。

当然戴康生参加撰写的文章和书籍绝不只有上述这些内容,据我所知,他还参加了《伊斯兰教面面观》及《宗教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科学新辞典》、《哲学大辞典》、《伊斯兰教辞典》等大型辞书的撰写工作,其中不少词条都是国内学界首创或首次引入的,有相当的难度。这类文章或词条自然不适合收入本文集,但我想对他的文集感兴趣的读者也很可能会对这些工具书感兴趣,因此顺便将这些书名介绍一下。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戴康生开始急剧消瘦,到年底,他明显地感到体力不支,连骑短途自行车都感气喘。我数次提出要他去医院检查,他都不肯,一则是因为与我们共同生活多年的老父亲得病住院,作为孝子,他每天都要往医院奔波探视,因而无暇再顾及自己;再者,如何使新兴宗教的课题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下去,这始终是萦绕在他心间的一件大事,因此他从不将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2002年3月初,他为新兴宗教课题的研究再次出差上海,与上海有关课题组成员协调并决定了召开讨论会的日期。就在他出差前后,由于我的力促,他总算答应去医院检查一下,谁知等待他的竟是小细胞肺癌已到达第三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几乎是当场被“判了死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充满乐观精神去面对死神,一次又一次去医院接受令人难以忍受的化疗和放疗,经过一年多时间与疾病顽强地抗争,最终仍未能战胜这万恶的小细胞肺癌,于2003年4月离我而去。尽管如此,他在我国这项开拓性的宗教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

综上所述,戴康生自1960年大学毕业直至他2003年去世这四十多年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都围绕着宗教,包括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四年,所研究的阿拉伯哲学也是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在